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

萧 功 秦

(XIAO Gongqin, 上海师范大学)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二十多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两次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本文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中分化出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派之争，再进一步分析九九十年代以后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思想分化，以及新左派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及其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两大类型，最后，本文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的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 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社会对文革灾难的反思，知识分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首先呈现的是一种在价值态度、思维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质性、共向性与板块性。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内部出现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之争。其原因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启蒙思潮本身在逻辑上就具有潜在的激进趋势。到了八十年代的后期，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经济领域的“官倒”现象的泛滥，自由主义思潮也随之日益激进化。这种情况下，强调政治秩序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作为对自由主义激进化思潮的反向运动而出现。这种自由与权威之争，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自由派强调个人自由权利、民主化，而新权威主义者则强调秩序与权威。但双方在中国最终的民主自由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

九十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以及与新保守主义的合流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苏东激进民主化的挫折，由于市场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相对得益，由于英美政治哲学开始在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主流开始走向温和化，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派（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保守主义（即新权威主义）逐渐合流，成为民间社会的思想基本趋势。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权钱交易、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逐渐在中国社会突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三种不同思想价值趋向：一，知识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观点认为，改革中的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必须付出的不可

避免的代价，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以及自由派右翼。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新左派的基本立场 作为第三种观点，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他们认为，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主张重新回到平等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他们“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价值。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两种类型 温和型新左派力图用西方新左翼思想运动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来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反思。他们是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从市场经济的过度膨胀产生的消极后果的角度，来表达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诉求的。此类新左派还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获得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们认为，我们不幸生活在西方人创造的东方主义的语境中，从而在根本上失去了中国的主体性。新左派以此来论说，来自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产权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新殖民主义者从文化上来征服第三世界的概念工具，他们主张建立自己的“抵抗话语”并以此拒绝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走市场经济化、民主自由化与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与温和派相比，激进新左派具有更强烈的底层意识，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倾向、强烈的反西方的情绪、道德优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类似雅各宾党的民众动员冲动。新左派的话剧《切格瓦拉》上演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看作是民粹主义新左派，即激进新左派在革命符号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现。它所体现的以暴易暴的情绪与价值倾向，将在未来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强的现实影响力。

知识分子思想之争的存在着三种前景 第一种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由于以上三种思潮都部分与政府主导的价值观存在着部分重合，因而它们在当下可以拥有自己的合法存在的空间。由于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分别主张自由、秩序与平等的价值，这三者的互补与对峙在正常条件下，有利于中国民主化所需要的思想多元化。并有可能为未来中国民主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第二种政治前景，是激进新左派与现代化过程中失利的下层绝望阶层结合，以发动一场反对“邪恶富人”的运动，力求在中国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虽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乌托邦实验只能导致对整个民族的一场巨大悲剧。然而，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下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少。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震荡。当权威主义的腐败陷入深重的危机，中国将可能会出现全社会的急剧民主化的浪潮。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种民粹主义式的民主与权威主义铁腕政治相互交替的不稳定局面。这此种情况下，新左派鼓吹民粹主义的劫富济贫的平等主义，迎合了大众对权威政治腐败产生的逆反心态，而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民粹主义的高福利、高就业的平等主义，就会成为社会大众普遍的诉求。

政治精英为了获取权力而力求迎合民众的经济要求。知识分子的左倾化、政治精英的媚俗化，与长期受腐败精英政治压抑的广大民众的平等主义诉求，这三者的结合，就会形成一场民粹主义的民主政治浪潮。一旦出现民粹主义的“劫富济贫”运动，另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又会倾向于保守的权威主义，主张回到铁腕式的精英政治，这样，就有可能在民粹主义的大众政治与权威主义的精英政治之间，形成钟摆式振荡的两极冲突模式。中国将陷入拉美化的政治陷阱。中国虽然充满矛盾，但经济发展态势基本良好，出现现代化断裂（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的可能性并不大，发生后两种趋势的概率并不高，这一分析主要具有理论上的警示意义。